

資政要鑑

第二卷



赵祿祥 主编
北京出版社

赵祿祥 主编

資政要鑑

第二卷

北京出版社



《资政要鉴》编委会

主 编:赵禄祥

副主编:(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宝珠	王兰锁	王怀志	王建吉
王朝中	田人隆	李世愉	李学东
李雪屏	杨军强	杨祥峰	武四海
林吉旺	岳会仁	饶江山	黄晓东
商 传	梁海俊	谢保成	翁殿璧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钊	马宝珠	王兰锁	王怀志
王建吉	王政尧	王朝中	田人隆
刘 驰	李世愉	李华瑞	李学东
李雪屏	杨军强	杨祥峰	张小也
陈 爽	武四海	林吉旺	罗燕生
岳会仁	孟彦弘	赵禄祥	饶江山
黄晓东	商 传	梁海俊	谢保成
翁殿璧			

本卷主编及撰稿人

主 编:王朝中 李世愉

撰稿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晓薇	王朝中	邓亦兵	田人隆
史志宏	吕鹏军	关树东	许 檀
李世愉	李锡厚	杨倩描	岑大力
林双木	罗燕生	封越健	宫 兵
高寿仙	高聪明	郭松义	韩树峰
魏明孔			

MAE 65/04

前言

本卷旨在通过介绍中国古代历朝的经济活动,反映出经济发展的规律,以及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

经济是基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经济活动,离不开经济建设;人类文明的进步也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① 没有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也就不会有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也就有了保证,国家也就能够富强;反之,经济不发展,人民的生活就没有保障,社会就不稳定,国家就会出现动荡,历史多次证明了这一真理。经济落后的国家还要受到强国的欺凌,“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人们是记忆犹新的。

经济活动,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或消费活动,是人们的主动行为,必然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进行。而中国历朝政府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制定,也都是为了发展经济,巩固统治。但是,人们的指导思想,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又要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如果人们的认识,政策的制定,适应了经济发展规律,就会取得成功,经济就会发展;反之,则欲速不达,乃至影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经济的发展。这在中国古代有着深刻的教训。当我们重温这一历史时,就会感到,不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留给后人的一笔财富。本卷正是从批判和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角度,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活动,以及历朝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客观的、历史的分析,力争从“史鉴”的角度给人以启迪。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我们有以下一些认识。

第一,农业是基础。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生产一直是社会经济中最为重要的内容。经济管理最初就是对农业的管理,而直到清朝,农业管理部门仍占重要位置。几千年来,农业生产的状况一直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尺度,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夏商及西周时期,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成为上古社会经济进步的基本条件,不仅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同时也为文化、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随之而出现了一个相对繁荣的历史时期。从秦汉以降乃至于清,几次“盛世”的出现都是依赖于农业的发展。即以康乾盛世为例,在耕地面积的扩大不及人口增长的情况下,清政府较好地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一系列问题,如多种形式的垦荒,水利的兴修,高产作物的推广,最终解决了粮食问题,为盛世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也是伴随着南方农业生产的突飞猛进而完成的。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对农业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历代统治者也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视。相传成汤时曾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①。盘庚曾告诫百姓,“若衣服田力穡,乃亦有秋”^②。《管子·七患》中所说“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代表了古代人对农业生产重要性的认识。《礼记·

① 《齐民要术》引《汜胜之书》。

② 《尚书·盘庚上》。

王制》甚至提出：“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更把农业发展摆在极为重要的位置。秦汉以后，封建政府对农业的重视程度更加深了。如《三国志·魏书·杨阜传》称：“致治在于任贤，兴国在于务农。”唐太宗目睹了隋末的经济残破，强调发展农业生产，指出：“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① 清初在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过程中，同样看到了“生民之本计在农”^②。从巩固统治的目的出发，历代政府都千方百计地发展农业，鼓励垦荒，注意改进生产工具，重视农田水利，强调田间管理，引进新的种植品种。尽管因战争的破坏，自然灾害的侵袭，政策的失误，使农业生产时好时坏，但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是在不断发展的，而且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

第二，“民为邦本”观念的确立。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的能动的要素。因为只有劳动者才能制造和改进生产工具，掌握和使用劳动资料，为社会创造日益增多的物质财富。在中国古代，对生产劳动者的重视体现在统治者认识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③。而这种观念在经济活动中的反映就是利民、富民政策的推行。历代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不先利民、富民，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社会经济的发展便是一句空话。先秦时，这种观念已经确立，如管子就提出了“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④；荀子主张“足国之道，节用裕民”^⑤；《史记·赵世家》更言：“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东汉的王符也提出了“为国者，以富民为本”^⑥。

① 《贞观政要》卷8，《务农》。

② 《岭南集》卷6，《兴修水利二十六陂记序》。

③ 《尚书·五子之歌》。

④ 《管子·治国》。

⑤ 《荀子·富国》。

⑥ 王符《潜夫论·务本》。

即使在分裂的三国时期,各国为壮大自己的力量,完成统一大业,也强调:“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①“国之有民,犹水之有舟,停则以安,扰则以危。”^②唐前期的繁荣兴盛,正是由于制定了“必先利民”的基本富国政策。宋代的苏辙更明确提出:“政无新旧,以便民为本。”^③以上各种提法虽然各有不同,但通过利民而达到富国的思想是一致的。历史事实反复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一个王朝初建或中兴、鼎盛时期,统治者都把利民作为发展经济的前提,从而取得了明显成效。而一个王朝的后期,由于广大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土地被兼并,生活无保证,社会经济必然遭到严重破坏,以致爆发农民起义,王朝崩溃。这种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汉代的荀悦曾以形象的比喻说:“足寒伤心,民寒伤国。”^④这的确是历史教训的总结。

第三,发展经济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提高、推广和普及。人们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对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有了一定的认识。中国古代,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因此,农业科技是提高、推广和普及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能够成为劳动者、知识分子和统治者的共识。从夏代开始,劳动人民为了保证农业丰收,已开始注意观察天象,留心天气变化。而古代历法的制定,众多农业谚语的产生,都是对农业生产所积累经验的总结,并对农业生产有指导作用。在古代的农业生产中特别强调不误农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⑤;“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⑥。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农业科技的总结、

① 《三国志》卷13,《魏书·华歆传》。

② 《三国志》卷57,《吴书·骆统传》。

③ 苏辙《傅尧俞御史中丞》。

④ 荀悦《申鉴·政体》。

⑤ 《孟子·梁惠王上》。

⑥ 《淮南子·诠言训》。

推广更深入了,不仅涉及谷物种植、田间管理、工具改进,而且涉及农田水利、选种、施肥等一系列发展农业所不可缺少的技术。而铁制农具的使用,牛耕的推行,都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在科学技术的总结、推广中,知识分子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把劳动者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形成一部部有影响的农业科技著作。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比较系统地总结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劳动人民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书中所载的旱农地区的耕作和谷物栽培方法,梨树提早结果的嫁接技术,树苗的繁殖,以及农产品的加工经验,都显示出当时我国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已达到相当高度。明末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包括农事、开垦、水利、农器、蚕桑等十二个门类,是一部重要的农业科学巨著。可以说,中国古代农书之多、水平之高,堪称世界第一。这些农业科技著作对指导农业生产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同时,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也能积极推广农业技术,以保证农业生产的发展。元代官修《农桑辑要》的推广,对指导农业生产产生了极大影响。清代农业科学著作《授时通考》的颁行,为农业技术的普及开辟了新路。除农业之外,在畜牧业、手工业、印刷业、交通业、航海业等许多方面都有一些传世的科学著作,至今仍有极大影响。四大发明更是备受海内外的赞誉。

但是,也应该看到,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对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普及还远远不够。这一方面在于统治者的短视,及措施不利。另一方面也受传播渠道的限制,及自然条件的约束。因此,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有很大差别。特别是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刀耕火种之法延续数千年之久。清康熙时,广西巡抚郝浴上任后指出,广西一些地区,灌溉“仍用马援旧法,全无安澜易运之便”^①。可见,要达到全国经济的同步发展,以科学技术加强

^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 86,《备述全粤情实疏》。

对落后地区的开发,以及加大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普及面是十分重要的。

第四,商业是发展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商业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走过艰难曲折的路程。夏代已经出现了商品交换,商代已有一些人除了从事农业外,还兼事经商,西周时商业有了发展,出现了一些以经商为主的新兴贵族。春秋战国时,商业发展更快,从而促进了经济的繁荣。这一时期的商业发展较快,主要原因在于经商能赢利,正所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①;“利之所在,天下趋之”^②。所以,当商人这一行当出现之后就备受世人重视。《韩非子·五蠹》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反映了经商已成为一种趋势。这一时期对商人的心态有形象、准确的描述。如《韩非子·备内》称:“與人成與,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與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與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慎子》外篇亦称:“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同时对商人的经营规律、诀窍亦多有记述。如《管子·乘马》称:“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国语·越语上》载:“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荀子·修身》称:“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以上都反映出先秦时期商业活动的频繁,以致人们对经商的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秦汉以后,商业发展更快。明清时的商品经济已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因此,传统观念将农业称为本业,而将商业视为末业。而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成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中的重要内容。其核心是对商业予以限

①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② 苏洵《上皇帝书》。

制。战国时李悝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源,商鞅认为农业可为战争提供兵源和战备物资,荀子强调农业是国家财政的基础。因此,他们主张对农业给予高度重视。他们并不否认商业的作用,但认为商业的发展会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减少农业劳动力,最终导致国贫,故须加以限制。商鞅变法时即实施重农抑商政策,韩非亦提出重本抑末理论。西汉重征商税,贬低商人地位,体现了这一思想。东汉的王符继续提倡“崇本抑末”。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对巩固新兴封建政治制度和发展社会经济曾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其消极影响日益明显。中国古代的商业正是伴随着这种思想束缚逐步发展的,南宋以后出现反对抑商观点。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论,认为以工商为末,乃“世儒”不察之故,“妄议抑之”^①。这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思想领域里的突出表现。鸦片战争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普遍有重商倾向。王韬认为,西方国家乃“恃商为国本”^②。郑观应提出:“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③传统的重农抑商理论受到资产阶级改良派重商思想的猛烈冲击,这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历史的经验证明,经济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凭主观愿望,用行政手段来压抑是压不住的。中国的商品经济在重农抑商政策的束缚下顽强地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五,对外开放是发展经济不可忽视的内容。中国历史上

①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

③ 《郑观应集·商务二》。

的对外开放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上。最早的对外贸易往来称互市、通商或通市。张骞通西域后,中国同西域各国的贸易逐渐繁盛,通商远达大秦(即古罗马帝国)。魏晋以后,西北陆路贸易更加繁荣,海上贸易也开始发展。隋朝在西北边境设交市监,唐初改称互市监,并在沿海设市舶司,专管对外贸易事,海路通商地位渐超过陆路。宋以后,海外通商更为重要,且有更大发展,形成“海上丝绸之路”。宋代于广州、临安(治今杭州)、明州(治今浙江宁波)、泉州等地设市舶司。元代则于泉州、广州、杭州、庆元(今宁波)、温州、澈浦、上海等地设市舶司。宋元的海外贸易超越前代而高度发达,至元代则达到鼎盛,与海外诸国的贸易范围更加扩大,进出口商品的数量、品种都在不断增加,形成了规模空前的国际市场。海外贸易的大发展,与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经济力量强大的国家,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可以提供充裕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海外贸易才有可能发展起来。此外,造船业的发展,航海技术的进步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写道:“中国人被称为不善于航海的民族,那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在航海技术上的发展,随时可见……而中国的海上舰队,在 1100—1450 年之间肯定是最伟大的。”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受到很大影响,这主要是由封建政府的海禁、闭关政策所造成的。明代在海上只准贡舶互市,而清初则实行海禁。虽然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禁,但与西洋各国贸易仅限于广州、漳州等少数几处。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对外贸易只限于广州一处,其他则全部关闭。如同商业的发展受到限制一样,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受到闭关政策的限制,大大影响了它的发展,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历史证明,实行开放政策,发展对外贸易,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大有益处的。反之,闭关自守,限制对外贸易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受到影响。

第六,因地制宜是发展经济的重要原则。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生态环境、自然条件有很大差异,因此,发展经济不可能强求一致。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统治者十分注意分析本国和其他国家自然环境的基本情况,目的在于利用本国的环境优势,以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管子·山至数》篇分析了五种不同地理环境的国家,包括山多地少的“山处之国”,水多地少的“汜下之国”,山地和平地对等的“山地分之国”,经常遭受水患的“水洿(溢)之国”,多沙而渗漏水源的“漏壤之国”,提出各国君主应当关注本国的自然地理环境。这就是强调要根据各地的条件,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商君书·算地》篇专门论析了秦国内部的自然地理环境,提出了“任地待役”,即区分不同土地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发展经济实力,以便进行备战。秦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增强实力,并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与秦国统治者正确分析和利用了本国的自然地理条件应该说有一定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在实践中是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的,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便是这个道理。随着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商业的发展,在许多地区出现了有当地特色的产品。如东汉王充说:“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纯妇无不巧。”^① 端砚自唐以来即为佳品,故李贺赞颂说:“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② 南宋以来,湖州所制毛笔天下闻名,时有“湖笔甲天下”之声誉。特别是景德镇的瓷器,其美名历久不衰。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个特点,而至清代,则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这无疑是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结果,对幅员辽阔的中国来说,这是一项重要的原则。

① 王充《论衡·程材》。

② 李贺《杨生青花紫石砚歌》。

第七,经济活动离不开管理。中国历代对经济活动都有严格的管理,不仅设立专管机构,而且还制定了相关的制度和政策。在中国古代,这种管理更多的体现在财政管理上,并且在长期的实践中有了理论上的提高,“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①,可以说是对这一点的深刻总结。自秦汉以降,历代的财政管理,凡有成效者,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一是强调开源节流,“源而流者岁旱不涸,蓄谷者不病凶年”^②,王安石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③。一是减轻人民的负担,从而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用以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轻徭薄赋,以宽民力”^④;“上不尽利,则民有以为生”^⑤;“用于国有节,取于民有制”^⑥;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财政管理中有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赋役制度。自秦汉以来,历代统治者都不断调整、完善这一制度,使其既能减轻人民负担,又能保证政府的收入。这的确是管理上的一大难题。唐代实行两税法,标志着古代税制的变化。宋代王安石变法实行募役法,明代推行一条鞭法,加大了对役法的改革力度。至清代实行摊丁入地,把人头税并入土地税,则是历史上一次成功的改革。它是在两税法、一条鞭法改革的基础上,彻底废除对人口的征收,从而完成封建社会后期以来历次税制改革并役于赋,人头税归入土地税的历史进程。它既是以前历次改革精神的继承,又是其最终的总结。作为经济管理制度中的一项改革,摊丁入地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

① 苏辙《上皇帝书》。

② 柳宗元《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③ 王安石《上皇帝万言书》。

④ 方勺《青溪寇轨》。

⑤ 苏轼《论河北京东盗贼状》。

⑥ 苏轼《叶嘉传》。

担,从而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一方面使清政府的一笔重要税收得到保障,有利于财政的稳定。这一改革反映了封建政府在长期的经济管理中不断总结经验,最终使管理能力、水平有了质的提高。而这种管理水平的提高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很多时候,由于财政管理混乱,造成封建国家的财政危机,以致加深、导致社会危机。这在许多王朝的后期有明显的表现。而财政管理混乱的主要原因多是人为的,例如宫廷的挥霍浪费,官僚机构的腐败,都会对经济管理工作产生严重的影响,其历史教训也是深刻的。

以上谈到的七个问题并不是中国几千年经济发展中的全部内容,但应该说是主要内容。本卷通过对历史上各个朝代经济方面有典型意义的内容加以阐述,力图从以上几个方面给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并为今天的经济建设提供某种参照。

目 录

前言	(1)
三代经济的稳步发展	(1)
西周后期经济观念的变化及其影响	(17)
春秋时期土地赋税制度的演变	(29)
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	(56)
秦汉土地问题的考察	(81)
秦汉农本与抑商之争	(108)
秦汉财政危机及对策	(136)
秦汉货币改革与法钱的确立	(164)
汉武帝与王莽改革成败比较分析	(187)
秦汉经济发展的新成就	(217)
干戈扰攘下的北中国经济	(238)
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南方经济的腾飞	(268)
劳动人口争夺战	(289)
步履维艰的南北朝商业经济	(311)
烟雨楼台中的寺院经济	(345)
隋代的民族贸易与张掖互市	(368)
隋唐国有土地的经营	(380)
隋唐手工业与我国经济重心的南北易位	(400)
隋唐五代财政制度的演进	(413)

唐代“必先利民”的富国之策·····	(429)
从租庸调到两税法·····	(442)
隋唐手工业的管理体制·····	(456)
唐代边贸互市的开与禁·····	(485)
隋唐五代国营畜牧业经济的兴衰·····	(498)
宋代农业的高度发展·····	(512)
宋代商业的繁荣与商业资本的发展·····	(530)
积贫积弱时代的两宋财政·····	(547)
从完全禁榷到不完全禁榷的宋代盐法·····	(560)
宋代货币流通体制的变化·····	(574)
宋代海上交通的拓展与国际市场的扩大·····	(589)
汉族封建经济关系对契丹社会经济发展的示范作用·····	(607)
西夏各民族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实现共同发展·····	(623)
金代猛安谋克屯田的终结·····	(640)
元代海外贸易的繁荣·····	(658)
明初的土地垦殖与经济作物种植·····	(677)
明代江南市镇的发展·····	(695)
明代的对外贸易·····	(714)
弘治年间的黄河灾害及治河·····	(737)
明朝嘉、万间的改革·····	(755)
清代垦荒的新成就·····	(775)
清代农业发展中足食良式的探求·····	(790)
人口与人手的思考·····	(804)
清代的摊丁入地改革·····	(821)
清代的商品流通与清政府的政策·····	(843)
集大成的清代救荒政策·····	(869)
清代区域经济的发展·····	(888)
寻富求强的洋务运动·····	(912)